

# 抗战时期陕西棉业研究\*

卢徐明

**内容提要:**抗战时期陕西棉业的发展在中国近代棉业史上有着特别的意义。随着抗战爆发后传统棉业格局的变化,陕西棉区不得不面临新的使命与困境,棉花生产在制度变化和技术改进的前提下,艰难地维持着与粮食作物间的相对平衡。传统棉花供需环节的断裂和后方各省对原棉的迫切需求,迫使陕棉转运川渝,虽然以政府和各大纱厂为主要运力,但陕棉的外销数量和比重都较战前降低。这一方面反映了战时棉花外销的实际困难,另一方面也为迁陕的当地机器纱厂提供了原料准备。战时纱布急剧短缺的环境下,陕西机器与手工棉纺织业出现了共同繁荣的局面。战时陕西棉业的发展,是全国经济格局变动下后方产业要素自身重组的结果,也反映出后方省际贸易和传统生产方式的复兴在保障战时经济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抗日战争 大后方 陕西 棉业

棉业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产业之一,其本身包含较广的范围,无论是作为农业活动的植棉业、商业活动的棉花贸易,还是作为工业活动的棉纺织业,都与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密切相关,因此近代棉业史一直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一大批学者已从中外交流、技术演进、市场变化、地方经济等多个角度对抗战前的中国棉业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sup>①</sup>同时,由于主题所限或其他原因,多数早期研究并没有有意识地将抗战时期的棉业发展纳入近代中国棉业的整体发展中讨论。<sup>②</sup>

由于自然条件和各地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近代中国棉业的发展表现出明显的地域分异特点。虽然各地棉业发展的实际状况十分复杂,但大致上,在抗战爆发前,中国商品

[作者简介] 卢徐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武汉,730079,邮箱:luxuming08@126.com。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近现代手工业史及资料整理”(批准号:14ZDB047)和华中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抗战时期大后方棉纺织业发展研究”(批准号:2018CXZZ058)阶段性成果之一。承蒙黄正林、石涛、张永帅教授对本文提出的宝贵意见,谨致谢忱!

① 代表著作如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赵冈、陈钟毅《中国棉业史》,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年版;森时彦著,袁广泉译《中国近代棉纺织业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羌建《近代南通棉业变革与地区社会变迁研究(1884—1938)》,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版;刘岩岩《民国武汉棉纺织业问题研究(1915—193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等。代表论文如徐新吾《对中国棉纺织手工业自然经济分解问题的一些讨论》,《上海经济研究》1981年第6期;汪敬虞《从棉纺织品的贸易看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张利民《试论近代华北棉花流通系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1期;陈惠雄《近代中国家庭棉纺织业的多元分解》,《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刘华明《近代百年间上海地区农民家庭棉纺织手工业的变迁状况及其原因》,《史学月刊》1994年第3期;王翔《近代中国棉纺织手工业的再考察》,《琼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彭南生《论近代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业的互补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张思《遭遇与机遇:19世纪末中国农村手工业的曲折经历——以直鲁农村手工纺织业为例》,《史学月刊》2003年第11期;马俊亚《工业化与土布业:江苏近代农家经济结构的地区性演变》,《历史研究》2006年第3期;李金铮《传统与现代的主辅合力:从冀中定县看近代家庭手工业之存续》,《中国经济史研究》2014年第4期等。

② 也有部分学者对战时上海棉业和日本在华纺织业进行了研究,如王子建《“孤岛”时期的民族棉纺工业》,中国近代经济史丛书编委会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10)》,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第1—25页;王菊《近代上海棉业的光辉(1945—1949)》,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王萌《战时环境下日本在华棉纺织业研究(1937—1941)》,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性棉区多集中分布在少数地区。同时,机器棉纺织业和手工棉纺织业之间也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地域差异,战前以生产机纱为主要内容的中国机器纺织厂主要集中在上海、江苏、湖北等比较发达的城市地区,城市周边及西南、西北广大内陆地区的机器纺织业则寥寥无几,其主要依靠手工纺纱或城市机纱的供给来生产手织布。这种国内市场之间花纱布的生产与流通在规模和形式上虽时有变化,但一直比较稳定。随着抗战时期中国传统棉区的相继沦陷,全国棉业格局因此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关中和成都平原成为仅存的主要棉区,沿海等主要棉纺织工业多陆续遭到破坏或陷于敌手,各地交通中断,传统花纱布交易秩序随之崩溃。更为重要的是,战时棉纺织业的性质也由一般日用品的生产变为重要的战略物资。战时环境下,地处内陆的川陕地区传统棉业的发展路径经历了怎样的变迁,如何将抗战时期大后方棉业的发展放在近代以来棉业发展的历史中进行客观的定位与评价,对于丰富近代中国棉业史和后方经济史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与价值。

目前学界对抗战时期后方棉业发展问题的研究,多侧重从战时后方农业改良和棉纺织业发展两个相对独立的维度进行,<sup>①</sup>缺乏对包括植棉业、棉花贸易以及棉纺织业发展这一完整产业链的整体考察。因此,本文的关注点在于,战时的特殊环境如何影响或改变了后方棉花的生产和运销,这种改变又如何影响了后方棉纺织业的发展和演化。

## 一、使命与困境并存:战时环境下的陕棉生产

棉业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产业之一,受自然条件、工业基础、交通状况、市场环境等各种条件的制约和影响,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近代中国棉业的发展表现出明显的地域分异特点,并一直延续至抗战爆发前夕。<sup>②</sup>战前中国各地棉花供需状况如表1所示。

表1 抗战前中国棉花供需地理分布表 单位:千市担、%

省别	1935年棉花生产量		1936年纱厂消棉量	
	数量	比重	数量	比重
江苏	3 731	28.9	6 984	64.6
浙江	709	5.7	143	1.3
山东	1 139	8.8	1743	16.1
湖北	1 452	11.3	581	5.4
河北	2 520	19.6	417	3.9
河南	1 124	8.7	358	3.3
山西	555	4.3	264	2.4
湖南	288	2.2	154	1.4
江西	222	1.7	97	0.9
广东	8	<0.1	42	0.4
陕西	1 133	8.8	30	0.3
共计	12 881	100.0	10 813	100.0

资料来源: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399页。

<sup>①</sup> 关于棉产改良的相关成果,如吴伟荣《论抗战期间后方农业的发展》,《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1期;郑起东《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农业改良》,《古今农业》2006年第1期;秦际芬《抗战时期四川棉业推广述论》,《农业考古》2016年第1期。关于后方棉纺织业发展的相关成果,如曹敏《抗战时期的陕西近代纺织工业》,《西安工程科技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李中庆《抗战时期四川手工棉纺织业的暂时繁荣》,《抗日战争研究》2016年第3期;彭南生、张杰《衣荒与应对:抗战时期四川手工棉纺织推广运动的兴衰》,《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刘鹏《延续与革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关中手工棉纺织业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17年;谭刚《战时手纺织推广与四川手工棉纺织业的复兴(1938—1943)》,黄贤全、邹英都主编:《西部史学》第1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sup>②</sup> 方显廷:《中国棉纺织业之历史及其区域之分布》,《经济统计季刊》第1卷第4期(1932年)。

从表1可知,战前中国棉区多分布于华北及东南沿海少数省份,其中江苏、河北、湖北、山东、陕西、河南六省皮棉产额相加为1 109.9万市担,占全国棉产的86.1%。同时,纱厂的分布则更加集中,仅江苏、山东、湖北、河北、河南五省纱厂年皮棉消耗量为1 008.3万市担,占全国纱厂消棉的93.3%。这种棉区与纱厂分布的地域分异状况决定了原棉与纱布的长距离运销成为必要,棉花及棉制品也因此成为近代国内市场上仅次于粮食的第二大流通商品,各省间通过相互调剂,实现优势互补。<sup>①</sup>若以棉花供需状况,将战前各棉区分为棉产有余纱厂不足、棉产不足纱厂有余、棉产纱厂基本自给三种类型,陕西即是第一种类型的代表。1935年陕西皮棉产量为113.3万市担,占全国棉产总数的8.8%,但因本省机器纺织业落后,纱厂需棉十分微小,战前纱厂消棉量仅3万市担,占全国纱厂消棉总数的0.3%。<sup>②</sup>陕西每年所产大量优质棉花多外销上海、天津、郑州等地,成为那里纱厂重要的原料来源。棉花成为陕西对外贸易最大宗商品类别,而陕西棉布输入量则常年高居不下,形成“卖棉买布”的贸易格局。

抗战爆发后,这一局面发生了根本性改变。随着战事范围的扩大,华北及沿海省份相继沦陷,棉业史学者胡竟良曾谈论道:此时棉田陷在战区者占90%,纱厂陷入敌手者占98%,布机所余亦不过千台,产棉省份仅余陕西、湖南、四川、河南西部及湖北少数县份,其棉田相加不过600万亩。<sup>③</sup>战时棉花对军需民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有人曾谓:“欧战时,有问最后胜利究属于谁?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未得一完满之答复;但若有人即以须具何种资源,方能制胜战争,将无疑义告以具有充分棉花之准备者,将得最后胜利。”<sup>④</sup>但棉花种植因受气候条件的限制,适宜地亩有限,“欲使西南棉产大量增加,为谋自给,一时尚属难能”。<sup>⑤</sup>多数省份陷入了“棉不够纺,纱不够织,布不够服用”的艰难境地。<sup>⑥</sup>发展后方棉业成为抗战建国的主要内容,“朝野上下遂对陕西棉区寄托了无限的期望”,陕西棉区地位得以大大提升。<sup>⑦</sup>

和这一增棉使命相伴随的,是战事对正常农业产销带来的破坏和影响逐渐凸显,此时的陕西棉业发展不得不面临诸多困难。

首先,战时农业生产方针调整,由战前大力鼓励植棉转而增粮减棉。战前六年,从全国范围来看,我国粮食总生产数与总消费数虽基本持平,但陕西却是为数较少的食粮消费多于食粮生产的省份。如战前的1936年,陕西粮食生产数为33 80万市担,而消费数则高达5 293万市担,相差1 913万市担,不足比例高达36.1%,在有数据统计的22省中居于首位。<sup>⑧</sup>小麦和棉花同为陕西主要农作物,二者在对土地的利用上,形成互相竞争关系,处此全面抗战时期,粮棉生产尤以食粮为要,陕西省政府遂计划缩小植棉范围,相应增加粮食作物的种植。1937年10月,陕西省棉产改进所以“陕西棉产改进事业不容中断”为由,请求陕西省政府,允许该所进行粮食作物试验推广是以保持原有棉产改良事业为前提,陕西省政府则以“应仍照本厅已定计划进行,以免分歧”,婉拒了棉改所的请求。<sup>⑨</sup>1938年3月,陕西省禁烟增粮会议议决,对原有产棉各县棉田超过耕地面积30%的县份,一方面由建

① 郭卫东:《印度棉花:鸦片战争之前外域原料的规模化入华》,《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5期;高王凌:《棉业历史与清代农村经济结构》,《清史研究》1997年第4期。

② 表1中1936年陕西纱厂消棉量为3万担,可能已将1935年大华纱厂内迁后的纱锭计入,若以1935年之前陕西本地纱厂消棉量计算,这一数值将会更小。

③ 胡竟良:《中国棉产改进史》,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28页。

④ 蓝春池:《棉花与国防》,《新大夏》第1卷第2期(1938年)。

⑤ 安华:《西北的棉花和纺织工业》,《抗建》1939年第17期。

⑥ 刘汉堃:《当前之棉纺织业》,《西南实业通讯》第8卷第6期(1943年)。

⑦ 常盼琴:《陕棉产销论述》,《纺织周刊》第8卷第15期(1947年)。

⑧ 朱通九:《战时经济问题》,世界书局1940年版,第237—238页。

⑨ 《陕西省政府关于抄发非常时期事业计划原审查意见一事给陕西棉产改进所的训令》(1937年10月26日),陕西省档案馆藏(本文所引档案均为该馆藏,以下不再注明收藏机构),陕西省棉产改进所档案,档号75-1-11,第11—23页。

设厅斟酌供需,在产棉县内划定植棉区域,在该区域外一律须改种粮食;另一方面由合作委员会限制棉业贷款,并由各渠管理局对未禁植棉田亩停止供给水量。<sup>①</sup> 播种期届,省府令“所有从前播种棉花及罌粟之地亩,应督促农民,尽量播种五谷杂粮”。<sup>②</sup>

随着农业生产政策的调整,陕西棉产改进机构被迫裁并,商业银行停放棉贷。为保证军粮被服供应,战时农业生产地位突显,“但此重大工作,又绝非一二机关所可能为力,在此非常时期,各机关拟即采取共同目标,集中人才,从事战时农业生产工作”。<sup>③</sup> 陕西省政府为谋求集中事权,统一规划全省农林事业发展,遂于1938年10月裁并陕西省棉产改进所,并连同林务局、农事试验场、垦殖畜牧场、棉花水杂取缔所及第一果园等机构合并成立陕西省农业改进所。相比战前的专门推广机构陕西棉产改进所,农业改进所的运行显得心余力绌,其全年经费规定为12万元,仅及改组前六机关经费总额五分之二强。<sup>④</sup> 对此有人感叹:“棉产运销机构,墮于中道,实棉业史上一大遗憾也。”<sup>⑤</sup> 受战事影响,成立于战前的各棉花产销合作社人心惶惶,导致银行生产贷款无法收回,合作社业务无形停顿。<sup>⑥</sup>

由于棉花外销困难,陕棉购买力持续下降。农业生产因缺乏弹性,多受自然环境的限制,不像工业可适应物价而随时调节产量,农民对作物种植的选择,多视其自身需要与收益而定。战前陕西棉价多追随上海市价,历年虽有波动,然每市担基本在30—50元之间。<sup>⑦</sup> 因受战事影响,战初陕棉东运受阻、出售困难,每市担由40元惨降至17—18元左右。<sup>⑧</sup> 游人高鉴寰于1937年12月路经陕西时,“亲睹棉花仍在田(往年此时已收获完事),任牛马践踏。即或收获,亦不经心,其中混合杆叶颇多。棉农对棉价之低落,长吁短叹不已!”<sup>⑨</sup> 因农人须以其所产棉花交换其他必需品,故棉花购买力对农家经济更为重要,在1937至1944年间,陕棉价格指数增长200余倍,同期小麦价格指数和物价总指数分别增长了230和680余倍,上涨速度较棉价更为迅速,故棉花实际购买力较战前降低。<sup>⑩</sup> 例如渭南蓝土布与棉花间的交换比率,在1937年每市斤棉花可换取蓝土布4市尺,至1938年10月同样单位的棉花仅能换得1.5市尺蓝土布。<sup>⑪</sup> 因此有人曾说:“关中植棉问题,症结悉在棉价,如棉价不能圆满解决,则棉田之有无,尤成问题。”<sup>⑫</sup> 至抗战后期,货币急剧贬值,棉花成为投机与囤积物资,棉价更难保证,植棉风险倍增。

对于农业生产活动来说,还应考虑战时劳动力的实际状况。战时陕西作为兵员补充与劳工征发的主要地区,农家劳动力数量急剧减少,而棉花的种植与收获又是各种农作经营中费工最多的活动,“今欲以缺乏农工之农家,经营需要农工甚多之作物,岂非自促其生路,故农工之减少,亦足使棉作减少也。”<sup>⑬</sup> 受此影响,植棉农户数量减少。据对陕西咸阳、泾阳等14县产棉区调查显示,在1941至1943年间,当地棉农占农户总数比重在植棉最多区域由71%减至59%,植棉次多区域由61%减至

① 《陕西省棉产改进所关于发促进陕西省禁烟增粮会议议决等情给陕西省建设厅的呈》(1938年3月5日),陕西省棉产改进所档案,档号75-1-336,第39—51页。

② 《秋收将完播种期届,督促农民尽量播种五谷》,《工商日报》(西安)1937年9月26日,第3版。

③ 《战时粮食生产实施工作中心纲要》(1937年10月),陕西省棉产改进所档案,档号75-1-11,第79—80页。

④ 霍席卿:《陕西农业改进之回顾及今后应取之途径》,《陕农月报》第1卷第1期(1940年)。

⑤ 夏少泉:《抗战后之陕棉运销概况》,《工业月刊》(西安)第1卷第4期(1944年)。

⑥ 《泾惠渠指导所给陕西省棉产改进所呈报本所派赵指导员连璧赴栎阳视察经过由》(1937年2月9日),陕西省棉产改进所档案,档号75-1-165(1),第21页。

⑦ 李国桢主编:《陕西棉业》,陕西省农业改进所1947年版,第211页。

⑧ 常盼琴:《陕棉产销论述》,《纺织周刊》第8卷第15期(1947年)。

⑨ 高鉴寰:《抗战期中之陕棉问题》,《西北论衡》第6卷第3期(1938年)。

⑩ 李国桢主编:《陕西棉业》,第227—228页。

⑪ 汪荫元:《棉价与棉农》,《新经济半月刊》第8卷第3期(1942年)。

⑫ 王桂五:《关中三年来棉种推广之检讨》,《农报》第8卷第1—6期合刊(1943年)。

⑬ 贾周:《陕西省棉花之产销概况》,《世界农村月刊》第1卷第5期(1947年)。

56% ,植棉最少区域由 46% 减至 37% 。<sup>①</sup>

在上述不利环境的影响下,陕棉逐渐减产,农民改种食粮者不在少数。另一方面,面对甘肃、青海、宁夏、绥远各省或产棉有限、或不产棉的现实,政府不得不再次重视陕棉增产工作。<sup>②</sup> 陕西棉产改进所领导人沈文辅也提出:“在此棉花销路发生问题之时,应予以缩减,然本省棉花之消费,亦需相当数量,数年来育成之斯字、德字二优良棉种,亦已繁殖相当数量,应设法维持,以免散失。”<sup>③</sup>因此陕棉生产在经历生产困境的同时,亦面临着新的机遇。

1943年4月23日,陕西省政府公布《棉花增产竞赛暂行办法》,并将增产情形列入县长考绩,以奖励棉花增产。<sup>④</sup> 曾于1937年停止的棉花生产贷款,也于1942年重新复活,由中国农民银行负责发放。陕西省建设厅、合作事业管理处、农业改进所等机关还联合组成“棉贷委员会”,以便贷款具体工作的推行。1943年共贷出24县,包含合作社(或农会)180个,社员103816人,棉田927179亩,贷款金额52487994.5元;1944年贷款县数扩大至31县,包含合作社(或农会)扩至275个,社员267175人,棉田2379389.8亩,贷款金额343978400元。<sup>⑤</sup> 此外,也有部分社会人士组织专门团体,以协助政府推进棉花增产工作。例如1943年2月,陕西省社会处、建设厅、农业改进所、合作事业管理处、中国农民银行、农林部推广繁殖站、农本局办事处等团体及部分热心棉业人士,鉴于抗战以来陕西棉产锐减的现实,特筹设陕西棉花产销协进会,以促进陕棉增产。<sup>⑥</sup>

表面上看,为使陕棉增产,既有竞赛奖励,又有贷款支持,但上述措施的实际成效却值得怀疑。主要原因在于抗战后期通货膨胀、货币贬值,“据农民们讲,在物价高涨之际,这些微的贷款,实在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sup>⑦</sup> 加上政府限价失当,以低于市面的价格收购棉花,遭到棉民多方抵制,政府对棉花管制过严,而对一般物价管制失效。时人邬翰芳曾对此评论道:“陕省府对于棉种曾实施计划,如以奖励征实,及棉田贷款,产棉竞赛等种种方法,刺激棉农多种棉花,然效果还是相当微薄。”<sup>⑧</sup> 在这些不利因素的影响下,战时陕西棉田面积不断减少,但值得注意的是,棉花产量的下降幅度较棉田面积明显较小,每亩皮棉产量更出现部分增高的情形。战时陕西棉田面积及棉花产量增减情况如表2所示。

表2 1936—1945年陕西省棉田面积及棉花产量比较表

年份	棉田面积(亩)				皮棉产量(市担)				亩产量(市斤)
	总面积	面积指数	良种推广面积	良种推广比重(%)	总产量	产量指数	水利灌区产量	灌区产量比重(%)	
1936	4 243 870	100	2 210	0.05	937 804	100	240 581	25.65	22.10
1937	4 687 357	110	19 017	0.41	1 109 849	118	179 798	16.20	23.65
1938	3 792 122	89	58 749	1.55	1 050 954	112	179 803	17.11	27.71
1939	2 795 617	66	250 526	8.96	971 402	104	303 979	31.29	34.75
1940	2 632 873	62	941 418	35.76	819 046	87	187 607	22.91	31.11

① 薛维宁:《棉田经济概况(一)》,《农业推广通讯》第6卷第9期(1944年)。

② 《陕西省棉产改进所关于发促进陕西省禁烟增粮会议议决等情给陕西省建设厅的呈》(1938年3月5日),陕西省棉产改进所档案,档号75-1-336,第39—51页。

③ 《陕西省政府关于发非常时期农业生产计划大纲等情给陕西省棉产改进所的训令》(1937年9月25日),陕西省棉产改进所档案,档号75-1-336,第9页。

④ 《陕西省三十二年各县棉花增产竞赛暂行办法》,《陕西省政府公报》1943年第849期。

⑤ 李国桢主编:《陕西棉业》,第266—267、271页。

⑥ 《关于陕西省棉花产销协进会成立日期给陕西省棉花产销协进会的指令》(1943年2月11日),陕西省建设厅档案,档号72-8-177,第1页。

⑦ 陈宏绪:《陕棉的命运》,《纺织工业》第8卷第1期(1947年)。

⑧ 邬翰芳:《西北棉毛丝麻纺织工业概况》,《陆军经理杂志》第7卷第5期(1944年)。

续表 2

年份	棉田面积(亩)				皮棉产量(市担)				亩产量 (市斤)
	总面积	面积指数	良种推广 面积	良种推广 比重(%)	总产量	产量指数	水利灌区 产量	灌区产量 比重(%)	
1941	1 995 987	47	1 261 308	63.19	766 877	82	273 473	35.66	38.43
1942	1 335 423	31	1 090 945	81.69	307 226	33	161 167	52.46	23.01
1943	1 447 811	34	1 121 469	77.46	468 296	50	201 528	43.03	32.35
1944	1 917 447	45	1 602 564	83.58	387 934	41	121 855	31.41	20.23
1945	1 886 887	44	1 719 506	91.13	317 824	34	262 825	82.70	16.84

资料来源:棉田总面积、皮棉总产量、亩产量数据采自李国桢主编《陕西棉产》,中国棉业出版社1949年版,第2页;良种推广面积数采自李国桢主编《陕西棉业》,第102页;灌区产量采自《陕西省水利局主要人员调查表及水利概况等统计材料汇集(一)》,陕西省水利局档案,档号96-1-96(1),第16页。

说明:棉田面积指数、棉花产量指数、推广比重和灌区比重系笔者计算得出;表中所采自《陕西棉产》之棉田面积数和《陕西棉业》之棉田面积数有轻微出入,不影响本文分析。指数均以1936年为100。

由表2可知,陕西棉田面积自1937年4 687 357亩减至1945年1 886 887亩,同期棉花产量从1 109 849市担减至317 824市担,除1944年和1945年外,棉花产量减幅均小于棉田面积减幅。亩产方面,1941年亩产量增至38.43市斤,较战前增长73.9%,其他年份也均高于战前。从另一方面来说,亩产量的提高正是战时陕西棉花生产“求质的改良与单位产量之增加,不求棉田量的扩充”的具体体现。<sup>①</sup>战时之所以能取得较高亩产量,除了战时生产制度的变化和部分年份气候条件较好外,和陕西始于战前并延续于战时的农田水利建设和良种推广不无关系。

陕西大规模兴修农田水利始于1928—1930年关中旱灾之后,各界计划将“三十年大旱十年小旱”的陕西,改造成“模范农田水利区”。<sup>②</sup>1932年泾惠渠修成后,灌溉面积70万亩,棉田占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左右,“以当时棉花贸易说,恐怕是国内最有名的棉区”。<sup>③</sup>泾惠渠在战时灌溉范围得到进一步扩大,1945年泾惠渠棉产为20.5万市担,占全省各渠棉产总量比重的80%。<sup>④</sup>由于有农本局与中国农民银行提供贷款,战时陕西汉惠、褒惠、泮惠、定惠、涇惠、涇惠、滂惠等水利设施得以继续修建。<sup>⑤</sup>棉花作为夏季需水较多的作物,多得一次雨或多灌一次水,每亩就可以增收若干,据陕西省水利局1942年统计,在泾惠渠、渭惠渠、洛惠渠、泮惠渠等灌区棉花每年较不灌溉地增收数量,分别为7万担、4万担、4万担、2.3万担,合计增收达17.3万担。<sup>⑥</sup>

战事爆发后,战前所兴起的全国各地棉产改良工作几乎前功尽弃,“唯一例外的是陕西省”。<sup>⑦</sup>由于棉种改良在战前已经取得较好基础,且推广工作牵连较少,故得以继续维持。<sup>⑧</sup>陕西棉产改进所非常时期事业计划中也明确指出:“棉花为工业上之重要原料,战事停止,需用仍多,为节省人力财力计,应利用最经济之组织与经费,设法维持基本事业。”<sup>⑨</sup>基本事业者,即为战前所试验培育的斯字棉与德字棉良种的保存和推广。据试验,斯字棉每亩产量可较陕西本地小洋花高出65%,比战前脱字

① 《陕西棉产改进所非常时期事业计划》,陕西棉产改进所档案,档号75-1-11,第12—23页。

② 陈赓雅:《西北视察记》(下),上海申报馆1936年版,第451页。

③ 李国桢:《洛惠渠放水后之陕西棉业》,《中国棉讯》第2卷第5期(1948年)。

④ 杜瑞培:《泾惠渠十四年》,《陕政》第7卷第11期(1946年)。

⑤ 石涛:《抗战时期农贷与陕西农村经济的发展——以国家行局为中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⑥ 《陕西省水利局统计工作报告》,陕西省水利局档案,档号96-1-467(5),第186页。

⑦ 赵冈、陈钟毅:《中国棉纺织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年版,第43页。

⑧ 王桂五:《关中三年来棉种推广之检讨》,《农报》第8卷第1—6期合刊(1943年)。

⑨ 《陕西棉产改进所非常时期事业计划》,陕西棉产改进所档案,档号75-1-11,第12—23页。

棉与灵宝棉亦高出 36%，远远超过了寻常标准。<sup>①</sup> 胡竟良曾说“陕西省受棉业统制委员会之余荫”，原因当在此处。<sup>②</sup> 1937 年斯字棉在陕西推广 1 万余亩，1938 年推广 4 万余亩，至 1939 年已在关中各县推广 19 万亩以上，此后推广范围继续扩大。<sup>③</sup> 从表 2 中也可看出，陕棉良种推广面积占全省棉田面积的比例，1936 年为 0.05%，1945 年增至 91.13%，增速相当惊人。以致于关中人民将斯字棉视为与泾惠渠一样的瑰宝，“今年棉粮比价失调，植棉无利可图，而陕西省仍能有一百五十万亩棉花生产者，斯字棉之力也。”<sup>④</sup>

总之，由于受战时农业政策调整、粮棉比价失衡等多重因素影响，陕西棉花增产工作显得十分艰难，但由于粮、棉均为战时必需物资，二者的生产一直保持着相对微妙的平衡。因此战时陕棉的生产过程并没有完全与战前脱节，甚至部分受益于战前农业环境的改善和战时的良种推广，在亩产增加的情况下，陕棉产量仍旧维持在一定的水平。当然，这种亩产量的增加与现在一般所说的集约生产是有一定区别的，因为前者并非完全自觉的产物，更多是战时环境下的被迫选择，这更类似于战时其他地区出现的“精耕运动”。<sup>⑤</sup> 战时陕棉产量的维持，使得其在调剂后方棉花供需方面也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 二、外销与内需：战时陕棉运销的变化

战前陕西虽产棉花，但当地纱厂缺乏，省内棉花需求较少，陕棉“除民间自用及小织布厂用少量外，率皆运销他省”，加以品质优良，陕棉受到郑州、上海和天津等地各大纱厂的青睐。<sup>⑥</sup> 陇海铁路于 1931 年后逐渐通至潼关、渭南、西安等地，便利了陕棉外运，“秦陕棉花，一周间可到上海”。<sup>⑦</sup> 棉花因此成为陕西对外输出数量最大的商品类别，其输出价值更占据了本省输出货品总值的大半，如 1932 年陕西输出棉花约 6 934 164 元，占输出货品总价值 9 368 734 元的 74%；若以输出量较多的 1936 年为例，输出棉花约 23 623 119 元，占输出货品总价值 29 286 741 元的比重则高达 80.7%。<sup>⑧</sup>

抗战时期，受国内市场棉花供需格局和战时环境的影响，陕棉在运销方向、运销力量和外销比重方面都发生了比较明显的改变。

### （一）运销方向由东输转南运

抗战爆发后，沿海纱厂倒闭，交通瘫痪，陕棉外销陷入困境。“自中日战事发生以来，棉花滞销，农村金融至受打击，农民辛勤所得，代价难期，影响生活，妨碍后方安宁，实非浅显。”<sup>⑨</sup> 因战时销路滞塞，花价涨落不定，买卖双方均徘徊不定，农民非至万不得已时，亦不将棉花出售。至于花商帮别，则多为邻近甘肃的小商贩，大商则无人问津。<sup>⑩</sup> 随后，平汉、粤汉交通稍复常态，陕西棉花可以经汉口转运至香港出售。但 1938 年 10 月后，汉口也遭陷落，陕棉转运香港路线又遭断绝。<sup>⑪</sup> 目前虽未见这段

① 冯泽芳：《陕西省斯字棉推广之经过》，《陕农月报》第 1 卷第 1 期（1940 年）。

② 胡竟良：《中国棉产改进史》，第 76 页。

③ 研究室辑：《抗战以来我国棉业建设概况》，《农本》1941 年第 55 期。

④ 冯泽芳：《抗战时期与建国时期之农业》，《中央周刊》第 8 卷第 1 期（1946 年）。

⑤ 曾雄生：《从“改进农作法”到“精耕细作”——延安大生产运动时期“精耕细作”提法的由来》，《中国经济史研究》2018 年第 4 期。

⑥ 华商纱厂联合会棉产统计部编印：《中国棉产统计（民国十八年）》，1929 年印行，第 39—40 页。

⑦ 通成公司天津分公司棉业部编：《陕豫棉况一瞥》，民国时期文献保护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民国文献类编·经济卷》第 496 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47 页。

⑧ 陕西省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十年来之陕西经济》，1942 年印行，第 174—175 页。

⑨ 《陕西棉产改进所给中央棉产改进所的电》（1937 年 10 月 12 日），陕西省棉产改进所档案，档号 75-1-267，第 10 页。

⑩ 《报告上涨附近农民棉花销售情形及棉花市场概况》（1937 年 10 月 3 日），陕西棉产改进所档案，档号 75-1-168(3)，第 130 页。

⑪ 王桂五：《关中之棉花棉赋与棉产》，《农业推广通讯》第 6 卷第 6 期（1944 年）。

时间陕棉转运香港的具体情况,但由于时间短暂,可以推测,转运香港的陕棉数量必定十分有限。

与陕棉传统上最大的东部消费市场沦陷相伴随的,还有后方各地纱厂原棉需求得不到满足。川渝地区历年所需原棉主要靠华中等地输入,由于抗战以来这些棉区相继沦陷,原棉需求缺口变大。据胡焕庸估计,战前四川年产棉约30万—50万担,以每人年需棉3斤计,全川年需棉约为150万担。<sup>①</sup>另据张肖梅估计,西南五省年棉纱原料欠缺数量为58万余担。<sup>②</sup>整体上,西南区各省棉花产量总计约为40万担左右,其能提供市场之用者,不过四分之一。<sup>③</sup>面对川渝纱厂原棉短缺的状况,时人也意识到:“实际上后方原棉并不短少,都是运销上的问题,因为那时陕豫等地的棉花,竟在有货无市的状态中。”<sup>④</sup>陕棉在东运受阻的情况下,不得不转而南运川渝。

长久以来,陕棉也有输入川区的历史,但因往年交通不便,运量较小。抗战前后,后方水陆运输条件得到改善,1936年川陕公路通车,1940年9月开辟了川陕水陆联运线,陆路全长为713公里,水程全长为400公里。<sup>⑤</sup>交通的改善为陕棉南销川渝提供了便利,自1939年起陕棉逐渐转销川渝,川陕道上,“满载棉花之卡车,不绝于途,以供分配于西部及西南各地”。<sup>⑥</sup>1939年2月28日,游人光鸿在经过川陕路段梓潼关时,就曾看到“运棉花的骡车络绎于途。赶车的披一件羊皮,大有陕西的风味”。<sup>⑦</sup>1936至1940年陕西省运销各地棉花数量情况如表3所示。

表3 1936—1940年陕西省运销各地棉花数量表 单位:千市担、%

年份	本省运出				外省经本省西运		外省运入本省其他站	
	运东路各省	运西路至宝鸡站	运西路至虢镇站	运出总数	运出数占当年百分比	到宝鸡站		到虢镇站
1936	1 043	—	—	1 048	93	—	—	—
1937	507	8	19	534	50	—	—	2
1938	199	121	72	372	36	8	0.3	21
1939	9	376	40	425	46	123	0.5	21
1940	—	360	91	391	39	47	0.4	10

资料来源:贾周:《陕西省棉花之产销概况》,《世界农村月刊》第1卷第5期(1947年)。

说明:本省运西路数量已减宝鸡二站东运数量。

由表3可知,战前运至东路输往郑沪曾是陕棉最主要的输出方向,在1936年运出总数104.8万市担中,该路运出多达104.3万市担,此数量在1937年以后开始逐年下降。运东路各省数量下降的同时,运至宝鸡站和虢镇站的数量逐年增加,表中运至宝鸡站数量大致可代表运川渝数量;运至虢镇站数量大致可代表运甘数量,运川数量在各路运输数量中所占比重在1939年以后达到最大。除有少量棉花西运甘肃外,南运川渝成为陕棉外运的最重要方向,运至川渝的棉花,除当地消费外,也有小部转销他省。

另一方面,陕棉南销川渝逐渐增加的趋势也可从重庆棉花来源地的变化中得到证明。抗战爆发前重庆棉花大多为从沙市运来的鄂棉,至1938年时,重庆主要棉花来源已变为鄂花占十分之六七,陕花占十分之三四。<sup>⑧</sup>至1940年沙市、宜昌相继失守,滇越路被切断后,外棉和鄂棉难以运入,重庆

① 胡焕庸编著:《四川地理》,正中书局1938年版,第31页。

② 张肖梅:《一年来吾国经济动向之分析》,《西南实业通讯》第1卷第2期(1940年)。

③ 黎小苏:《陕西的棉花》(上),《工业月刊》(西安)第1卷第6期(1944年)。

④ 徐南:《棉花增产与运销》,《农业推广通讯》第6卷第6期(1944年)。

⑤ 谭刚:《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内河航运建设》,《抗日战争研究》2005年第2期。

⑥ 《陕棉产可由公路运川》,《建国月刊》(金华)1940年第1期。

⑦ 光鸿:《川陕道上七日记》,《今天》1939年第21期。

⑧ 陈敬先:《重庆之棉花市场》,《经济汇报》第5卷第5期(1942年)。



棉花市场“仍有贮存的陕棉,源源南运”。<sup>①</sup> 陕棉南输川渝路线,先多由陇海路或其他途径运至宝鸡,再由宝鸡运至川渝。由宝鸡运川路线主要有以下四条:(1)由宝鸡经川陕公路直达广元,取道水路至重庆;(2)由宝鸡沿川陕公路至阳平关,再由水路经广元至重庆;(3)由宝鸡沿川陕公路至双石铺转甘肃徽县后,再转白水江、嘉陵江而广元而重庆;(4)由宝鸡直接用汽车运输。<sup>②</sup>

陕棉外销线路的变化,相应影响了陕西省内主要棉市地位的变化。抗战时期陕西棉市变化的主要趋势表现为本省西部棉市的兴起和东部棉市的衰落,尤以朝邑及渭南棉市的衰落和泾阳及宝鸡棉市的兴起为主要特点。朝邑曾为陕西第二大棉花市场,战前该县全年可产棉 250 万—260 万斤,附近韩城、郃阳、澄城等地棉花也多先集中于朝邑,再转销于外地市场,各帮棉花商贩来此购买者甚多。<sup>③</sup> 1934 年,朝邑棉花交易占全省棉花总交易数的 18.8%,至 1940 年则降至 1.4%,衰落明显。<sup>④</sup> 朝邑棉花交易量锐减,商人交易的形式也由以往整批交易变为零星购运,致使该地设于战前的棉花检验处已无存在必要,遂于 1940 年 9 月裁撤。<sup>⑤</sup> 渭南棉市的衰落同样明显,在 1934 年,渭南棉花检验数量占全省比重为 51.6%,至 1940 年这一比重减至 20.7%。朝邑和渭南棉市衰落的同时,泾阳和宝鸡棉市则兴盛起来。1934 年时,泾阳棉市交易量仅占全省 10.1%,至 1940 年增至 40.7%,成为当时陕西最大的棉花市场。<sup>⑥</sup> 宝鸡棉市于 1939 年后逐渐兴盛,光是每年由泾阳、渭南、咸阳等产区运集宝鸡的棉花,就在 38 万担以上,约占陕西省额的一半,“成为战时陕豫棉花转运入川之枢纽”。<sup>⑦</sup>

## (二)政府和纱厂为主要运销力量

战时棉花包装材料简陋,沿途仓储不善,亏耗增加,以及其他因管理不善而产生的意外损失,使一般小规模经营棉业的人望而却步。<sup>⑧</sup> 战时陕棉外运的困难,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棉花购运方式的变化,“旧日陕省棉花贩运事业,泰半操诸商人”。<sup>⑨</sup> 和战前以商人为主要购运力量不同的是,战时此项业务则多由政府及各大实力雄厚的纱厂来组织经营。陕棉购运在 1943 年前主要由两大系统进行收购,一为政府组织的农整会及农本局福生秦庄,二为大华和申新等后方各大纱厂,1943 年后政府施行纱花布全面管控,原棉多由政府统一配售,纱厂自由购运业务遂告停止。

其一,农整会及福生庄购运情况。针对战时陕西棉花外运的困难,陕西省政府特电请中央农整会拨款进行收购,农整会曾在陕西咸阳、泾阳、渭南等主要产棉区设立专门收买处,主要业务由中国棉业公司负责进行。<sup>⑩</sup> 但“惜于此时太原相继沦敌,潼关岌岌可危,总处未敢大量汇款来陕,遂使收购工作时进时停”。农整会收购陕棉数量有限,在其不到一年的存在时间里,在陕收购总数仅 5 万市担,所收棉花除在陇海铁路通车汉口时运汉一部分外,其余均由宝鸡转运入川。<sup>⑪</sup>

随着农整会收花业务的停止,1938 年 7 月国民政府于经济部农本局下设立福生庄,以负责各地原棉的收购与运销,福生庄在陕西宝鸡、渭南、咸阳、泾阳、三原、朝邑等地分别设有办事处,负责具体收购工作。<sup>⑫</sup> 自成立后,1939、1940、1941 年福生庄在陕收购棉花数分别为 77 201 担、102 669 担、

① 俞启葆:《再论抢救陕棉》,《纺织周刊》第 9 卷第 19 期(1948 年)。

② 贾周:《陕西省棉花之产销概况》,《世界农村月刊》第 1 卷第 5 期(1947 年)。

③ 李桂:《各分行处报告:朝所》,《陕西省银行汇刊》1935 年第 3 期。

④ 李文奎:《抗战四年来陕西之棉业》,《陕农月刊》第 2 卷第 7—8 期合刊(1941 年)。

⑤ 贾周:《陕西省棉花之产销概况》,《世界农村月刊》第 1 卷第 5 期(1947 年)。

⑥ 李文奎:《抗战四年来陕西之棉业》,《陕农月刊》第 2 卷第 7—8 期合刊(1941 年)。

⑦ 杨逸农:《我国棉花市场》,《经济汇报》第 9 卷第 10 期(1944 年)。

⑧ 韩甘霖:《陕棉收购运销的几个实际问题》,《农本月刊》第 58、59 期合刊(1942)。

⑨ 夏少泉:《抗战后之陕棉运销概况》,《工业月刊》(西安)第 1 卷第 4 期(1944 年)。

⑩ 《中央农整会收买陕棉》,《申报》1937 年 11 月 18 日,第 3 版。

⑪ 夏少泉:《抗战后之陕棉运销概况》,《工业月刊》(西安)第 1 卷第 4 期(1944 年)。

⑫ 福生总庄:《本局福生庄业务概况》,《农本》1940 年第 34 期。

40 000担,三年合计收购 219 870 担。<sup>①</sup>其收购数量虽较农整会时期有所增加,但相较陕棉待运总数,仍相差悬殊。曾任职于福生庄陕西办事处的夏少泉在后来回忆时对此评论道:“福生庄既以救济农民和收储棉花满足后方所谓军需民用为主要任务,那么就应充分利用该庄坚强的人力和充裕的资金大量收储,以三年时间收储 100 万担是不成问题的。但是由于资金不肯源源拨汇,致使收花业务不能大量开展,时收时停,人力也得不到充分利用。”<sup>②</sup>这一评论部分反映出农本局购运工作存在的局限。<sup>③</sup>

其二,各大纱厂购运情况。与政府购运数量较小相比,各大纱厂成为战时陕棉购运的主要力量。当时在陕购运纱厂主要有大华和申新两大系统。大华系统方面,设于西安的大华纱厂和设于重庆的裕华纱厂均系因战事迁入,同为裕大华企业集团下属分厂,为求战时原棉采办及转运便利,二厂于 1940 年成立棉花联合采购部,总部设于重庆,采办处设于西安,运输处设于广元,将从陕西收购的棉花自己打包运输,以减少成本。为此,大华纱厂于 1940 年专门购置汽车 40 辆和胶轮大车 100 余辆,组织运输队进行运输。<sup>④</sup>1943 年,国民党政府对花纱布实行全面管制后,企业不能自营,联运处才撤销。在 1938 至 1943 年间,联采处为大华和裕华分别购进原棉 20 257 件和 40 798 件。<sup>⑤</sup>

申新系统方面,申新四厂系 1938 年由武汉迁入宝鸡的纱厂,同属申新公司的申新五厂则于战时迁至重庆,为供给申新渝厂原棉需要,申新宝鸡厂同样与申新渝厂制定了联合购运陕棉办法。申新在陕收购棉花多由纱厂通过经纪人向花行购买,仅渭南一地同宝鸡申新有经济往来的花行就有同丰源、大成、祥泰等 20 多家。这些大纱厂的购棉因多享有特权而较为便利,如申新作为“军需机关纺纱厂”,规定可以收购一年用量的棉花,并由政府核发“准购证”。<sup>⑥</sup>除 1940 年资料缺乏外,1939 至 1945 年间申新宝鸡厂、申新重庆厂分别在陕收购棉花数量为 202 470 市担、416 789 市担。得益于此种联合收购方式,上述纱厂在战时原棉得到较好保证,“纱厂原棉经常存储到足够一年以上的运转”。<sup>⑦</sup>

除了上述两大系统外,中国银行投资的雍兴公司所属蔡家坡纺织厂也是陕棉采购的重要力量。1939 年 7 月至 1940 年 6 月间,雍兴公司在秦、豫两省购进原棉共 15 000 余包。<sup>⑧</sup>在 1937 年 11 月关于陕西棉花市场概况的调查中,豫丰、农本局、大华和华兴名列陕棉主要买客。<sup>⑨</sup>“泾阳、三原及河南灵宝一带的棉花市场上,福生庄、大华纱厂、雍兴公司和申新纺织厂成了最大的几家棉花收购顾主。”<sup>⑩</sup>宝鸡作为陕棉南运川渝的中转地,站内多数棉花亦系大华、申新、中国银行各家存棉。<sup>⑪</sup>据 1941 年国防最高委员会对敌经济封锁委员会对后方各省货运调查显示,宝鸡输川的棉花中,计农本局 10 000 担,豫丰纱厂 3 000 担,大华纱厂 1 000 担,申新纱厂 1 500 担,其他棉商约 5 000 担。<sup>⑫</sup>1943

① 李国桢主编:《陕西棉业》,第 303 页。1939 年收购系数指 1938 年 10 月至 1939 年 9 月间所收购数量,其后各年类似。

② 夏少泉等:《中国棉业公司福生庄抗战期间经营陕棉业务的回忆》,陕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陕西文史资料》第 23 辑,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47—148 页。

③ 战时农本局工作开展不力还存在政治斗争等其他方面的原因。参见傅亮《抗战时期的“平价大案”始末:以农本局改组为中心》,《江苏社会科学》2015 年第 1 期。

④ 陕西公私合营大华纺织公司秦厂组织编:《大华纺织公司秦厂厂史》,陕西棉纺织公司档案,档号 166-1-522,第 6—7 页。

⑤ 《裕大华纺织资本集团史料》编辑组编:《裕大华纺织资本集团史料》,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72、365 页。

⑥ 萧尹:《宝鸡申新纺织厂史》,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93—94 页。

⑦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荣家企业史料》(下),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202、209、308 页。

⑧ 《雍兴公司整理秦省购存棉花谈话会记录》(1940 年 10 月 7 日),雍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档案,档号 82-1-138(4),第 166—168 页。

⑨ 《棉花市场概况调查表》(1937 年 12 月),陕西省棉产改进所档案,档号 75-1-300(3),第 121 页。

⑩ 萧尹:《宝鸡申新纺织厂史》,第 95 页。

⑪ 《宝鸡市场情形》,《农本月刊》1942 年第 60 卷。

⑫ 国防最高委员会对敌经济封锁委员会编:《各省货运调查报告》,郑成林选编:《民国时期经济调查资料汇编》第 23 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95 页。

年国民政府施行花纱布管制政策后,管制局所收陕棉除就地拨交在陕各纱厂外,仍转运入川,供西南各厂使用。

### (三) 外销比重较战前降低

战时陕棉南销川渝虽为东路断绝后的运销难题提供了较好的解决方式,政府及各大纱厂的联合购运也方便了陕棉外销,但战时棉市供需、运输工具、运输时间各方面却难以和平时相比,“棉花运销者每谓现在的棉花运销事业,最困难的是棉花运输问题”。棉花运输的困难直接影响了陕棉外销比重的降低。

首先,全国棉市供需格局的转变,成为战时陕棉外销比重降低的根本原因。过去陕棉销路,大部分经陇海、同蒲两铁路输出沪汉等东南省份,据统计,1934 年仅通过陇海路各站运出的陕棉数量即达 501 690 担,约占当年陕棉总产量的近六成。<sup>①</sup>就棉市需求来说,战前的沪、汉等地作为全国最大的纱厂集中区,对陕西原棉有着强大的需求,而战时川渝地区纱厂对原棉的需求能力,则和前者无法相提并论。再从棉花供给的角度来看,战时迁陕纱厂的增加,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陕棉在省内市场的消耗比重。

其次,随着棉花运输方向的改变,陕棉南运必须经历艰险而漫长的路途。除川陕公路外,从广元到重庆的嘉陵江水道运棉往往风险较高。美国记者格兰姆·贝克曾亲眼看见嘉陵江中挤满了帆船和舢板,其感叹“这些就是这河湖纵横的半个国家的主要运输工具”。<sup>②</sup>其他如人力橡轮板车和兽力橡轮大车行驶十分缓慢,以其运输陕棉,由宝鸡至成都约需时一月,若加上商人在产地购货及至成都销货时日,需时则多达两月。<sup>③</sup>受此影响,战时陕棉运销在季节分配方面一反常态,与战前形成很大区别。战前棉运时间集中于当年 10 月至次年 4 月,此间运销量约占全年 88%,其他月份运量一般较小;而战时各月较为平均,同期运量约占全年 70%,此种变动的主因在于战前货运畅通,客商多愿于新棉收获之际购进棉花,赶价或候价脱售,而战时棉花转运川甘二省,改以畜力或人力为主要运输动力,动力供给不足,致短时间内未能大量运出。<sup>④</sup>

再次,运力不足成为战时陕棉运输中不得不面对的问题。陕西省内棉花,多先集中于陇海铁路沿线的渭南与咸同铁路沿线的三原及泾阳等地,再由火车西运至宝鸡,但战时军需紧迫,火车运务繁重,陇海路局车皮不够分配,加上机车用煤缺乏,“这一段铁路运输,已使拨车皮装车,望穿秋水”。<sup>⑤</sup>汽车运输方面,战时燃油短缺,又大多为政府征用,民运汽车数量较少。陕西省政府为支持陕棉外运,解决汽车燃油短缺问题,曾特令省公路管理局装置木炭代油炉汽车 15 辆,以装运陕棉入川。<sup>⑥</sup>除火车和汽车外,在各种运输工具中,“长途兽力板车,长途人力橡轮板车船筏等业,特占后方运输之重要地位”。<sup>⑦</sup>特别是兽力橡轮大车因制作简便、成本较低,成为陕棉运川的主要工具,如宝鸡方面输川运输力量即由各机关及纱厂贷款,组成兽力橡轮大车,计驮运所约 2400 辆,农本局 400 辆,大华纱厂 100 辆。<sup>⑧</sup>传统的运输方式驿运也在此时得以复兴,1938 年 9 月,陕西省政府委员韩光琦发起用皮轮车运陕棉去川的计划,并制定了详细办法。<sup>⑨</sup>陕西省政府亦曾计划,将本省余棉“拟借宝成公路之便,用驿运办法,奖励橡轮车,由宝鸡运至广元”。<sup>⑩</sup>为了供应四川纱厂的棉花需求,减省陕棉运川的压

① 李国桢:《陕西省棉业之回顾(十六)》,《西京日报》1935 年 9 月 29 日,第 6 版。

② 格兰姆·贝克著,朱启明、赵叔翼译:《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7 年版,第 131 页。

③ 李国桢主编:《陕西棉业》,第 239 页。

④ 李文奎:《抗战四年来陕西之棉业》,《陕农月刊》第 2 卷第 7、8 期合刊(1941 年)。

⑤ 韩甘霖:《陕棉收购运销的几个实际问题》,《农本月刊》第 58、59 期合刊(1942)。

⑥ 《救济本省农村经济,大量推销过剩棉》,《工商日报》(西安)1938 年 10 月 20 日,第 2 版。

⑦ 谢澄、陈春航:《成都市运输业概况调查》,《建设周讯》第 10 卷第 19—22 期合刊(1942 年)。

⑧ 国防最高委员会对敌经济封锁委员会编:《各省货运调查报告》,郑成林选编:《民国时期经济调查资料汇编》第 23 册,第 295 页。

⑨ 《韩光琦发起用皮轮车运陕棉去川》,《国风日报》1938 年 9 月 24 日,第 3 版。

⑩ 《各地金融经济概况——西安》,《中行月刊》第 17 卷第 5、6 期合刊(1938 年)。

力,经济部西北工业考察团甚至还曾建议在距离川北较近的陕西汉中区大力推广植棉。<sup>①</sup>

由于运力不足,运费也因此而变得高昂。1941年4月,陕西棉花价格每市担190元,而重庆却要420元,两地相差显著,“此种差价全由运输困难所造成”。<sup>②</sup>当时虽有川陕公路之便,陕棉可销往川渝,但因运费太贵,出售亦很困难。<sup>③</sup>战时运输本身成本高昂外,棉花购运及沿途检查规定繁苛,更使商民裹足。商人购棉被当地政府无理查扣之事在当时颇为常见,1942年12月,某商人曾在陕收购新棉1900余包,却以陈棉违法未登记为由被当地查扣。据该县商会陈述,该项棉花纯系新棉,有产地、产期、税票、合格证和购买单据等可资证明,并曾呈报宝鸡物资局备案,但“竟以新作陈,强行判定”而被查扣。<sup>④</sup>

由于陕棉市场供需格局的变化和运输困难,战时陕棉外运比重较战前明显降低。据白阴元估计,在1939至1944年间每年外运陕棉数量约在28万担左右。<sup>⑤</sup>从西安市花行经营陕棉情况来看,也是“销售本省纱厂者半,运销陕南入川者半”。<sup>⑥</sup>从另一方面来讲,战时陕棉外销比重的降低在客观上为本省机器棉纺织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原料准备,也为发展陕西手工纺织业提出了迫切要求。

### 三、机器与手工互补:战时陕西棉纺织业的发展

战前陕棉虽产量丰富,但本省纺织业却不发达,使得本省所需纱布长期依靠省外输入。据陕西实业考察团估计,1931年前后陕西省全年输入棉布数量为100余万匹。<sup>⑦</sup>此后,随着陇海铁路的西延,每年输入陕西的棉布数量快速增长,1934至1936年间陕西输入棉布数量已达300万匹以上。<sup>⑧</sup>战事起后,陇海铁路断绝,陕西纱布输入变得十分困难,在1938至1940年间,陕西从省外年均输入的棉纱和布匹数量,仅及战前七分之一。<sup>⑨</sup>同时,陕西大量棉花却面临外销困难,因此“陕西战时棉业上最严重之现象,为生产有余,加工不足,如能设法将过剩棉花制成纱布,则本省棉业问题当可解决过半”。<sup>⑩</sup>另一方面,战时的特殊环境却给陕西机器纺织厂的建立带来了契机。战事起后,为保存抗战力量,国民政府令沿海等地纺织厂迁至后方继续生产,陕西成为纱厂内迁的主要落脚地,“本省纺织业于此时大为抬头,有一日千里之势,其工厂之设立,如雨后春笋。”<sup>⑪</sup>伴随工厂的内迁,还有技术工人的内迁,《西北文化日报》曾报道,1938年8月有汉口女工2000余人,启程来陕。<sup>⑫</sup>纱厂和技术人员的内迁,为陕西机器棉纺织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战时后方的特殊环境,也为内迁纱厂复工初期的生产和销售提供了盈利空间。陕西省内丰富的棉花资源,方便了内迁纱厂原棉采购,降低了纱厂生产成本。例如大华纱厂全年共需棉72000市担,均购自泾阳、三原、渭南、临潼等县。<sup>⑬</sup>1938年8月迁至宝鸡的申新第四纺织厂,月需原棉约一千数百担,均由三原、泾阳、渭南等地购运。<sup>⑭</sup>市场方面,西北地区庞大的纱布需求,为内迁纱厂产品的销

① 李琴芳编选:《经济部西北工业考察团报告》,《民国档案》1992年第4期。

② 黎小苏:《陕西棉业问题改进刍议》,《陕西企业》1942年创刊号。

③ 《陕棉产销情形》,《染织纺周刊》第5卷第1期(1940年)。

④ 《宝鸡县商会代电》(1943年1月30),陕西省建设厅档案,档号72-3-1041,第31—34页。

⑤ 白阴元:《陕棉之出路》,《公益工商通讯》第1卷第5期(1947年)。

⑥ 葆真:《陕西棉业概况》,《陕行汇刊》1941年第5期。

⑦ 陕西实业考察团编:《陕西实业考察》,汉文正楷印书局1933年版,第440页。

⑧ 《裕大华纺织资本集团史料》编辑组编:《裕大华纺织资本集团史料》,第175页。

⑨ 李文奎:《抗战四年来陕西之棉业》,《陕农月刊》第2卷第7、8期合刊(1941年)。

⑩ 黎小苏:《陕西棉业问题改进刍议》,《陕西企业》1942年创刊号。

⑪ 宋国荃:《陕西省工业调查》,《经济汇报》第8卷第8期(1943年)。

⑫ 《汉女工二千余启程来陕》,《西北文化日报》1938年8月19日,第2版。

⑬ 常盼琴:《陕棉产销论述》,《纺织周刊》第8卷第15期(1947年)。

⑭ 《宝鸡虢镇工业调查报告》,《陕行汇刊》1941年第2期。

售提供了有利条件,战时大华纱厂收购棉花每担通常较沪、汉低3—4元,而售出布价每匹却较沪、汉高1元左右。<sup>①</sup>该厂在战前棉价昂贵期间,受外厂布匹排挤,销场有限,其购棉只求足用,“西路行销,秦州一带为畅,平凉迤西市场,向以湖北关布为利销,未便争夺,最近已无外厂来陕收花,价格一再跌落,现高花较战前约跌近一倍,于大华厂收买,最易得手,更因布匹腾昂,出售亦利,获赚可观”。<sup>②</sup>由于原料价格低廉和成品售卖市场广阔,纱厂盈利也变得可观。

但内迁纱厂毕竟数量较少,生产能力有限,后方纱布需求仍难以满足。加以内迁时机器损耗严重、新机购置不便,生产过程面临被轰炸的危险,致使在1942年以前,申新等棉纺织厂现存的生产能力都不能充分加以利用。<sup>③</sup>1940年5月,陕西大华纱厂、咸阳纺织厂、雍兴蔡家坡和申新宝鸡等主要纱厂合计纱锭数为78000枚,实际现开锭数仅为32000枚,实开数不足一半。<sup>④</sup>另据经济部工矿调整处1942年4月对后方纱厂生产状况的调查,陕西开工纱锭数为53014锭。根据黎小苏估计,1942年陕西棉纺织业机纱年产量为23000件,棉布产量为405000匹。<sup>⑤</sup>这与战前每年输入300万匹纱布的数量相比,差距十分悬殊。但纱布的需求并未减低,因军队被服使用的增加,致使后方纱布供需矛盾依然严峻。<sup>⑥</sup>

实际上,从陕西省棉花各种用途分配比例来看,纱厂用棉所占比重确实不高。根据一项对陕西13县的调查显示,纱厂和军用两项所消耗的棉花数量有限,在1941至1943年间,每年纱厂用棉只占陕西省各种棉花用途的16.2%、16.5%、20.1%,若加上相应年份军用棉花比重7.7%、10.8%、4.5%,也仅占陕棉各种用途的四分之一左右,而棉絮和民间纺纱用棉数则皆超过前者,两项相加约占陕西棉花各种用途的七成左右。<sup>⑦</sup>此时,陕西棉业的现状表现为机器棉纺织厂数量少,产量较小,难以满足布匹供给;另一方面当地所产棉花仍不能全数消纳,对此情形,除督促已有纱厂加大生产外,提倡各地手工纺织业变得十分迫切和必要。<sup>⑧</sup>

另一方面,传统手工纺织业自身的部分特点也有其适应战时生产的一面。战时空袭频繁,不适合大规模集中生产,手工纺织业则规模小、经营分散、生产灵活,恰能减少敌机轰炸所造成的损失。手工棉纺织业资金投入较小,原料亦可就地取材,方便于短期内建立。<sup>⑨</sup>生产效率方面,据估计,若一般农村妇女每人每日可纺8支粗纱6两,假定农村有40万妇女,每2人可纺纱1磅,暂以纱厂每锭每日纺纱1磅计,则40万妇女,即可抵20万锭的纱厂,以之织成土布,则月可达40万匹,即可抵最新式动力铁机4000台的生产力。<sup>⑩</sup>“况国难日亟,全国一致抵抗日货之际,推广家庭手工业,有为经济绝交之根本办法,诚能家置一机,数口之家,尽可自给。”<sup>⑪</sup>

传统手工纺织业在陕西社会有着比较悠久的历史,特别是在关中地区,农村手工棉纺织业较为发达,农村妇女几无人不娴熟纺织,部分地区所产土布除自用外甚至还能输出外省。但往昔妇女纺

① 民建陕西省委、陕西省工商联史料采编组:《西安大华纺织厂概述》,甘肃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西北近代工业》编写组编:《西北近代工业》,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43页。

② 《抗战期中本市工商业现况》,《工商日报》(西安)1937年11月28日,第3版。

③ 白吉尔:《中国的民族企业与中日战争:荣家申新纺织厂》,张宪文等编:《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540页。

④ 李文奎:《抗战四年来陕西之棉业》,第2卷第7、8期合刊(1941年)。

⑤ 黎小苏:《西北的棉纺织工业》,《工锋月刊》第1卷第2期(1944年)。

⑥ 陈敬先:《农本局福生庄营运花纱布匹业务概况》,《经济汇报》第3卷第11、12期合刊(1941年)。

⑦ 薛维宁:《棉田经济概况(续完)》,《农业推广通讯》第6卷第11期(1944年)。原表1942年各项数据分别为40.4%、28.1%、15.8%、10.4%、1.3%,经核算总计项数据为96%,笔者按比例进行了修正。

⑧ 安华:《西北的棉花和纺织工业》,《抗建》1939年第17期。

⑨ 高叔康:《中国手工业概论》,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第34页。

⑩ 郭翰芳:《西北棉毛丝麻纺织工业概况》,《陆军经理杂志》第7卷第5期(1944年)。

⑪ 邓黎僧:《推广陕西家庭染织手工业之我见》,《西京日报》附刊《建设周刊》1933年第31期。

织只是作为农村家庭副业的一部分,纺织工具多用旧式纺车,生产方式较为落后。自1933年陇海铁路通车西安后,机纱机布以其优良质地、低廉价格,大量输入本省,省内土布销路日益萎缩,致使手工纺织业日渐衰落,大多数农村妇女已不再从事纺织,<sup>①</sup>“织布之家,渐见减少”。<sup>②</sup>手工纺织业之所以在战前出现衰落,是其在机器纺织业竞争下难以满足社会发展的要求使然。所以,战时手工棉纺织业的发展急需克服生产技术落后、产品售出困难的弱点。因此,“它必须革新,必须用国家的力量加以改造,使它脱掉陈旧的甲壳,使它在新的基础上更生起来,如果,它不经过一番的更新,它不但要成为将来经济发展中的‘鸡肋’或‘盲肠’,而且以它这样‘老态龙钟’衰微的力量,也不能应付当前的急需”。<sup>③</sup>战时陕西省政府和各界的提倡和推广,对克服以上困难发挥了较大作用。

1938年3月31日,陕西省政府委员会第104次会议通过《陕西省手工业奖励办法》,随后颁布各县施行。<sup>④</sup>各县为响应省政府要求,相继发起纺纱运动。例如1940年洛川县为倡导妇女家庭纺织业,发起“一户一纺车”运动。<sup>⑤</sup>1942年商南县以“四一纺织运动”作为其年度中心工作,即一女一纺车,一甲二织机,一户一亩棉,一乡一工厂。<sup>⑥</sup>土布推广方面,1938年3月1日,陕西省特设土布推广处,委任省合作委员会办事处主席杨性存兼任处长,并颁发服用土布实施办法,通令各县切实推行。<sup>⑦</sup>嗣后,省政府又规定凡公务员须一律服用土布,并由省主席孙蔚如亲自倡导。此外,省政府还制定了关于土布技术改进的奖励办法,以提高土布品质。<sup>⑧</sup>陕西省建设厅为推广纺织技术,曾令各县设立织布传习所,分期传习新机使用技术,以指导织布生产。<sup>⑨</sup>

对于土布出售困难的情形,陕西省主席孙蔚如曾电请经济部部长翁文灏划拨专款,以便收购:“本省已拟有提倡土布生产办法,但非大量收购,一切无由实现。查陕省为后方重要地区,军衣原料,尤应早为储备,此项土布,质料坚韧耐久,自属适用”,故拟请经济部设法代购。<sup>⑩</sup>陕西省针对以往各农户织造土布规格不一的情况,特颁布相关具体要求,土布规格的统一为政府收购提供了方便。陕西省政府曾将兴平县双山农工促进社出品的土布寄送军政部军需署请其检验,检验结果合于军用,省府特令土布推广处转饬该促进社,此后织造布匹应与此次标准相同,希望其能精益求精,继续发展。<sup>⑪</sup>其余品质较差的土布,亦有用途,“其质地稀薄者,经脱脂漂白后,供作缠伤纱布”。<sup>⑫</sup>

此外,农产促进委员会、西北工合、妇女慰劳会、培华女校、陕西省手工纺织业促进会及当地其他社会力量也为手工纺织业的推广做了一定努力。农产促进委员会主任穆藕初特拨专款,以作提倡纺土纱之用,并与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西北区办事处商定合作方案,分别在宝鸡、西安、凤翔、陇县、南郑、凤县、城固、褒城及兴平等地发动纺纱运动。<sup>⑬</sup>陕西省妇女慰劳会,鉴于战时后方工业生产的重要意义,特于1938年1月14日邀集各界人士,举行战时生产谈话会,决定以提倡家庭纺织业为中心工作。<sup>⑭</sup>西安培华女校也曾得到省府支持并拨款4000元,计划在陇县聘请专家教授,举办土布技术人

① 陕西省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十年来之陕西经济》,第141—142页。

② 陕西实业考察团编:《陕西实业考察》,第436页。

③ 陈洪进:《手工纺织业的推进在全国经济建设上的意义》,《农本月刊》1942年第60期。

④ 《本厅拟订陕西手工业奖励办法及省府训令》(1938年3月31日),陕西省建设厅档案,档号72-2-931,第1页。

⑤ 戴鞍钢、黄苇主编:《中国地方志经济资料汇编》,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9年版,第247页。

⑥ 《陕商南提倡纺织》,《中国工业》(桂林)1942年第4期。

⑦ 《土布推广计划文》,《工商日报》(西安)1938年2月27日,第2版。

⑧ 《陕省提倡土货运动的检讨》,《工商日报》(西安)1938年6月13日,第1版。

⑨ 《救济农村经济指导土布生产》,《工商日报》(西安)1937年11月8日,第3版。

⑩ 《调剂农村经济,收买本省土布》,《西京日报》1938年1月23日,第3版。

⑪ 《军需署采购兴平农工促进社土布》,《工商日报》(西安)1938年5月12日,第1版。

⑫ 《中国战时之棉业调整》,《中外经济荟萃》第3卷第4期(1939年)。

⑬ 《七七棉纺织机在西北推行状况》,《农业推广通讯》第2卷第8期(1940年)。

⑭ 《提倡战时工业生产,妇慰劳会推进家庭纺织》,《工商日报》(西安)1938年1月14日,第3版。

员训练班,学员毕业后可分发各县指导生产。<sup>①</sup> 1942年12月26日,陕西省手工纺织业促进会举行成立大会,省政府主席熊斌等人曾亲临致辞,以表支持。<sup>②</sup> 可见参与推动战时陕西手工棉纺织业的力量是比较多元的。

在陕西省政府和各界的提倡和推广下,战时陕西手工棉纺织业得到较快发展。经过战时几年的发展,“各县穷乡僻壤,无人不娴熟纺织,每年出品,除自用外,且可运销他省”,在纺织业较发达的兴平、蒲城、礼泉、澄城等地,有织布机5万余架之多,其普遍程度由此可见一般。<sup>③</sup> 手工纺织工厂数量在战时得到快速增长,据黎小苏统计,战前陕西省棉纺织工厂数为50家,资本1238万元,动力1004马力,至1944年增为110家,资本4539万元,动力6099马力。<sup>④</sup> 棉纺织业在各类工业中比重的增加,更能显示出战时陕西棉纺织业在当地经济中的地位。1943年陕西省各类工业数量比重情况如表4所示。

表4 1943年陕西省各类工业数量比重表

类别	工厂		资本		动力		工人	
	家数	比重(%)	万元	比重(%)	马力	比重(%)	人数	比重(%)
纺织业	106	42.9	3437	49.6	3641	52.3	7328	55.4
机器铁工业	57	23.1	772	11.1	611	8.8	2151	16.3
化学业	19	7.7	935	13.5	266	3.8	748	5.7
制革业	14	5.7	118	1.7	27	0.4	514	3.9
面粉业	10	4.1	639	9.2	622	8.9	118	0.9
造纸业	4	1.6	172	2.5	79	1.1	114	0.8
印刷业	4	1.6	104	1.5	135	1.9	594	4.5
打包业	2	0.8	100	1.4	478	6.9	104	0.8
火柴业	2	0.8	84	1.2	275	3.9	222	1.7
其他	29	11.7	572	8.3	835	12.0	1320	10.0
总计	247	100.0	6933	100.0	6969	100.0	13213	100.0

资料来源:陕西省政府统计室编印:《陕西省统计资料汇刊(三十四年辑)》,1945年印行,第92页。

由表4可知,在陕西各类工业类别中,棉纺织业厂数为106家、资本额为3437万元、动力数3641马力、工人数7328人,各项指标占各业总数的比重分别高达42.9%、49.6%、52.3%、55.4%,均远多于其他行业。<sup>⑤</sup> 可以认为,经过抗战时期的发展,棉纺织业已逐渐成为陕西最重要的工业门类。

手工棉纺织业比机器棉纺织业分布范围更广,数量更多,吸收了更多的从业人员,这在农家从事纺织业人员比重方面得到了体现。据1940年西北农学院对陕西临潼和兴平两县236户农家调查显示,当地农家人口从事农、工、商、学、兵、家庭纺织以及其他职业、职业不明各类的比重,临潼县分别为33.2%、0.5%、0.5%、7.8%、4.5%、25.4%、1.9%、26.2%;兴平县分别为25.7%、1.1%、4.8%、6.7%、2.8%、30.2%、2.3%、26.5%。从此项数值来看,兴平县从事纺织业人数比重高达30.2%,甚至超过从事农业人数比重;临潼县虽稍低,亦占有25.4%,两县平均比重高达27.8%,仅次于从事农业平均比重29.5%。<sup>⑥</sup> 1946年,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农业经济系袁克义等人调查兴平时对家庭纺织有

① 《培华女校训练土布技术人员》,《工商日报》(西安)1938年3月31日,第2版。

② 《陕西省手工纺织业促进会成立》,《国风日报》1942年12月27日,第2版。

③ 宋国荃:《陕西省工业调查》,《经济汇报》第8卷第8期(1943年)。

④ 黎小苏:《西北的棉纺织工业》,《工锋月刊》第1卷第2期(1944年)。

⑤ 该表虽然没有说此处纺织业统计是否仅指棉纺织业,但可以肯定的是战时陕西麻纺织业和毛纺织业相较棉纺织业,数量十分微小。

⑥ 熊伯衢、万建中:《陕西农业经济调查研究》,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第2编《乡村经济卷》(上),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201页。

直观印象,“我们走到每一个农家,可以看到妇人和小女孩都在呜呜的纺棉,‘呼呼’的织布。”<sup>①</sup>

战时陕西手工棉纺织业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也发生了相应改变。生产工具方面,纺机多由原来的木机改为较先进的铁机,在三原县,因年来纱布产品的缺乏而促成铁机布厂普遍增设,城南布厂曾达170余家,布机1000余台。<sup>②</sup>改良纺车在陕西其他地区也得到普遍使用,愈启葆在关中考察时感悟道:“最近手纺织之推进,中央与地方政府不遗余力。在民间可以随处看到改良纺车。”<sup>③</sup>在生产方式上,由于军需民用数量巨大,“陕西土布乃又重新抬头,惟由纯粹的家庭手工业渐进为工场手工业了。”<sup>④</sup>相比以往农村妇女的纺织旧法,此时采用新式七七式、业精式、兴国式等改良纺纱机的城乡小规模纱布厂,与前者有着根本区别,二者虽同为手工业,但“前者为纯粹家庭工业,后者则渐进为工厂手工业”。<sup>⑤</sup>

棉纺织业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的变化,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也影响了部分农村妇女的生产生活。战时多数农家以生产效率更高的铁织机代替了原来所使用的木织机,二者在使用方式上有着显著区别,铁织机的使用对从业人员臂力和脚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战时大量手工纺织厂的存在,改变了以往妇女只是将纺织作为家庭副业的生产习惯,对妇女走出农家工作产生了较大影响。据学者相关研究,为适应新的纺织要求,战时陕西农村妇女缠足现象明显减少,特别是在纺织业较发达的兴平、洛川等地这一特点表现得更为突出。<sup>⑥</sup>可见抗战时期陕西棉纺织业的发展,对当地社会经济各方面都产生了比较深远的影响。

#### 四、余论:从“内部”看战时后方经济的演变

抗战时期是大后方经济发展较快的一个阶段,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抗战给西北带来了诸多现代化的因素,促进了西北社会经济变迁,加快了西北社会的现代化进程”。<sup>⑦</sup>正是抗战时期在近代西北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使得这段时期也被学者誉为近代西北开发的“三次高潮”之一。<sup>⑧</sup>更有甚者,则以“危机下的转机”或“危机与契机”来形容抗战时期后方经济的变化。<sup>⑨</sup>这些说法无疑都很有见地,特别是抓住了战时所出现的新的社会经济因素在西北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这类研究倾向于强调“外力”对西北这个“他者”的影响,似乎成了近代西北经济史研究中的“冲击—反应”模式。如何从西北社会经济本身传承与延续的自身特点出发,来理解近代以来西北经济的发展演变过程,似乎更值得关注。以陕西棉业为代表的后方产业在抗战时期的发展与演变,为我们深入理解战时后方经济发展的特殊性 with 复杂性提供了可能性,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可供进一步思考。

① 袁克义:《兴平调查归来》,《西北农报》1946年创刊号。

② 《三原手工纺织业》,《工业月刊》(西安)第1卷第2期(1944年)。

③ 愈启葆:《关中植棉之考察》,《新西北》第3卷第2期(1940年)。

④ 黎小苏:《西北的棉纺织工业》,《工锋月刊》第1卷第2期(1944年)。

⑤ 陕西省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十年来之陕西经济》,第141—142页。

⑥ Laurel Bossen, Xurui Wang and Melissa J. Brown, “Feet and Fabrication: Footbinding and Early Twentieth-Century Rural Women’s Labor in Shaanxi”, *Modern China*, Vol. 37, No. 4 (July 2011), pp. 347–383.

⑦ 黄正林等:《笔谈抗日战争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2期。另外,黄正林将全面抗战时期西北经济的变化和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开发西北结合起来,强调从近代长时段来看,西北地区传统经济向现代转型的过程是缓慢的,认为处于“慢变量状态”(详见《农村经济史研究——以近代黄河上游区域为中心》,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617—620页)。

⑧ 其他两次高潮分别为左宗棠任陕甘总督和20世纪清政府实行新政时期,也有学者认为在此基础上应该将以张穆、何秋涛、龚自珍、林则徐和魏源等人所提出的移民边疆、抵御沙俄侵略的主张作为国人开始在理论上重视西北边疆之肇始,再加上刘锦棠巡抚新疆时期和冯玉祥集团入主西北时期,以此形成“六次高潮说”。参见尚季芳《从移风易俗看冯玉祥集团入主西北的思想意义——兼论近代开发西北“三次高潮说”的局限性》,《历史教学》2015年第11期。

⑨ 王荣华:《危机下的转机——抗战时期的陕西机制面粉业》,《抗日战争研究》2014年第1期;王荣华:《危机下的转机:国民政府时期的西北经济开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等。



第一,从“产业内部”来理解。战时后方经济的发展,是在全国经济格局调整的背景下得以完成的。战争导致国内主要棉区和纺织工业区相继沦陷,传统市场供需体系受战事影响几陷于瘫痪,陕棉生产不得不面临诸多困境。战时增加生产成为后方社会支持抗战的主要途径,陕西棉区战略地位大大提升,战时国民政府财力、物力的投入给后方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条件。陕棉生产并没有与战前完全脱离,而是借助于战前水利建设与良种推广的基础,以通过提高单产的方式来艰难进行,这种技术密集型的发展方式与以往中国农业生产中扩大耕种面积的途径形成鲜明对比。抗战时期也成为近代陕西棉业发展的重要阶段,战时陕西棉业的发展,改变了当地长期以来输出原棉、输入成品纱布的贸易格局,奠定了关中纺织工业的发展基础。可以说,战时后方经济的发展,不仅是政府行政干预的结果,也是战时全国经济格局在传统市场供需体系断裂后,后方产业要素自身重组与演变的结果。

第二,从“区域内部”来理解。战时后方经济的发展,是通过西南、西北各地之间资源的互相调剂、优势互补来进行的,是后方各省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认清这一点,对于战时后方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问题的认识至关重要。正是由于战时后方经济与对外贸易的断绝,使得传统物资供需环节断裂。就棉业来说,相比战争对后方农业生产的影响,棉花运销方面的困难则表现得更为突出,战时运销路线的改变和运输工具的缺乏,都影响了陕棉外运比重的降低。但中国大后方内部社会同样蕴藏着巨大的自然与社会资源,和战前运销沿海城市或出口国外相比,战时这些资源在后方省份之间的流通规模得到扩大,战时后方皮毛业、桐油业等多种行业皆出现了“内向化”的特点。<sup>①</sup>由于政府和社会各界在后方物资动员和调剂的需要,战时后方省份内部并没有出现长期明显的“滞销”现象,后方省际贸易在此时得到了发展,战时后方川渝等地棉纺织厂正是在源源不断的陕棉供给中得以发展壮大。

第三,从“传统内部”来理解。战时物资短缺的特殊环境下,后方机器和手工业经济都得到了较快发展,在部分地区的部分行业中,手工业经济甚至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这一特点对审视近代以来机器与手工业发展的关系提供了重要补充。在传统纱布来源断绝、内迁纱厂生产能力不足的现实下,陕西机器棉纺织业和手工棉纺织业出现了相互补充、共同繁荣的局面。兴起于抗战时期的独特条件,使得陕西机器和手工棉纺织业的发展各具特点,和后方重庆等地战时机器棉纺织的发展相类似,战时陕西机器棉纺织的发展也属于直接“移植”的结果,具有产生较迟、起步较快的特点。“对于全国棉纺织工业的发展却意义不大,因为它差不多只是机器在国内发生了地理上的位移而已,并未造成中国棉纺织工业量的增加。”<sup>②</sup>与近代以来河北高阳等地手工棉纺织业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半工业化”<sup>③</sup>相比,战时陕西手工棉纺织业的繁荣与此有着显著区别。因为前者主要依靠技术的革新和区域外市场的扩大自然发展起来,后者的发展虽然表面上也存在生产技术的革新和部分市场的扩大,但这一现象更多缘于战时纱布急剧短缺的特殊现实和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提倡。

无独有偶,从更大的范围和行业来看,战时后方手工卷烟业、手工制糖业、手工造纸业、手工蚕丝业、手工面粉业、手工木刻业、驿运等多个传统行业,均不同程度地以“传统的复兴”的方式发展起来,在抗战时期的后方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sup>④</sup>其经营形式更为多元,家庭经营、工场经营和合作社经营等多种形式并存。在生产技术上,或充分利用资源区位,进行水力加工生产;或部分采用新式

① 谭刚:《抗战时期西北皮毛贸易与大后方经济变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2年第1期;谭刚:《西南土产外销与大后方口岸贸易变迁(1937—1945)——以桐油、猪鬃、生丝和药材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2期。

② 陈昌智:《旧中国重庆机器棉纺织工业发展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年第4期。

③ 彭南生:《半工业化:近代中国乡村手工业的发展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11—280页。

④ 樊果:《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主要手工业概况——试析手工业在近代中国社会经济中的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2018年第5期;徐兴旺:《国统区在抗战时期的木刻运动》,《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艾约博著,韩魏译:《以竹为生:一个四川手工造纸村的20世纪社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李佳佳:《因运而生:抗战时期西北驿运再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17年第3期等。

机器工具,对传统技术进行改进,出现类似“石磨+蒸汽机”的中间技术。<sup>①</sup>传统与现代总是相伴而生,在近代以来的经济发展中,随着技术的进步或生产方式的改善,部分行业开始变得难以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要求,逐渐萎缩,甚至在现代经济发展较快的东南沿海等地已消失不见,但在中国内陆的西南和西北部分地区,其依然顽强地抵抗着现代经济的侵袭,由于自然与社会环境的巨大差别,二者有着截然不同的生存空间和发展路径。战时物资急剧短缺的客观环境,为这些传统行业的复兴提供了新的机会,其对支援抗战胜利更是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 A Research on Shaanxi Cotton Industry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Lu Xuming*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Shaanxi cotton industry has a special significance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otton industry in China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With the changes of traditional cotton industry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Japanese invasion of China in 1937, the Shaanxi cotton area has to face a series of new missions and dilemmas. Under the premise of institutional changes and technological improvements, cotton production has struggled to maintain a relative balance with food crops. The breakage of traditional cotton market supply and demand, and the urgent demand for raw cotton in the rear provinces forced Shaanxi to transport it to Sichuan. Although the government and major company were the main transport capacity, the export volume and proportion of Shaanxi cotton were lower than before. This reflects the practical difficulties of exporting cotton during wartime. On the other hand, it also provides some material preparation for the local machine mills. In the environment of a sharp shortage of wartime gauze, Shaanxi machinery and the hand-made cotton textile industry have seen a common prosperit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haanxi cotton industry during the war was the result of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rear industrial elements under the changes of the national economic structure. It also reflected the important role played by the revival of the inter-provincial trade and traditional production methods in safeguarding the wartime economy.

**Key Words:** Anti-Japanese War, Rear Area, Shaanxi, Cotton Industry

(责任编辑:王小嘉)

<sup>①</sup> “石磨+蒸汽机”这一“中间技术”的说法,是彭南生在论证中国近代手工业“中间经济”的地位时提出的,泛指手工业生产中传统手工工具与现代技术的结合模式。详见《中间经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国近代手工业(1840—1936)》,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00—205页。